

从达蓬山出发……

走近徐福

周乃复 著

慈溪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二〇〇七年十月

从达蓬山出发

走近徐福

周乃复著

慈溪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2007年10月

从达蓬山出发 走近徐福

周乃复著

出版 慈溪市对外文化交流协会

慈溪市徐福研究会

开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张 8

字数 190千

印数 1-1500册

版次 2007年10月第一版

自序

得悉慈溪市领导将采取措施大力支持达蓬山徐福传说和徐福其人其事的研究，并希望以此为桥梁加强与日本民间的联系，推动中日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很受鼓舞。为了使人们对国内外徐福研究的情况，对达蓬山与徐福东渡的关系有所了解，以便更好地参与讨论和研究，特将我陆续发表的有关文章，挑选一部分结集出版，供大家参考。

我市出现徐福热较迟，我更是在中、日掀起徐福热十多年之后才投身其间。其时，我国的徐福研究形势，已与初始时期大为不同，存在着一种不是太好的倾向，我曾在多种场合提出质疑。后来，看到了严绍璁教授在北大作的一个学术报告，他也对徐福研究中的一些倾向提出了严肃的批评，这更让我坚信：徐福研究界的这种倾向，正在影响着研究和利用的深入发展，而且正在促使早期对徐福研究作出过重要贡献的专家，先后从徐福研究领域淡出，徐福热也开始成了纯粹的旅游开发热，学术氛围正在渐渐消退。这种状况如果任其发展，最终将会使旅游开发也因失去学术研究的支撑而归于昙花一现。

这种倾向，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严重忽视了对徐福传说这份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研究，没有认识到留存于民间的徐福传说，虽然不是原典性史料，无助于史学考证，





但却像温家宝总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所下的断言一样，“是民族文化的精华”、“是民族智慧的象征”、“是民族精神的结晶”，应予十分珍惜。另一方面，在纯史学的考证中，又有人违反史学研究的原典性实证方法，在史料严重缺失的情况下，急于作出某种结论，竟将只能用作参考的千余年后的资料，拿来实证秦汉时期的历史。甚至还非科学地将徐福传说历史化、现实化，作为历史考证的资料来应用。两者交互作用的后果，既严重贬低了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徐福传说的价值，又使徐福其人其事的研究因不够实事求是而不被许多人所接受，使徐福其人其事在许多人心仍继续着“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局面。

正是在看到了这种倾向之后，我才开始了对徐福其人其事以及徐福传说的研究工作。在这以前，虽也写了一些文章，却多是对各地研究成果的转述，文中常渗透着上述倾向的影响。而此后的习作，则努力从三方面展开，试图摆脱这种影响。一是继续进行徐福其人其事的研究，但不把推理拔高为定论。如《古代移民和徐福东渡》一文，就试图通过历史文献资料、广泛的传说、以及吴越地区的地理状况、经济与航海条件、吴越文化与日本弥生文化的关系、日本的吴越移民王国等方面的分析，讨论徐福在吴越地区东渡的可能性。二是努力开拓对徐福传说的研究，如《一份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达蓬山徐福传说》一文，对达蓬山徐福传说的内容、类型，它在中、日、韩徐福传说系列中，特别是在浙东徐福传说中的地位，它的学术文化价值等方面，尽可能作较全面的考察。又如《试解“徐福西归之谜”》，将韩国的徐福传说、浙东的徐福传说和史籍记载的秦代当年的政治形势进行对比研究，揭示达蓬山徐福传说产生的历史背景，同时对徐福来浙的具体时间作出推论。三是收集日本、韩国的徐福传说，并通过电视记录片的形式向国内关心徐福问题的人们介绍，希望通过这种方式，介绍日本研究

徐福传说的情况，希望有所借鉴。

收在本书中的文章分为三组：第一组是近年新发表的文字，从中可看出我摆脱上述倾向的努力，也提出了一些新看法。第二组是部分旧文的选刊，以介绍徐福热发展状况为重点，并留下一些我参与徐福活动的痕迹，从这些文章中还反映了作者的观点和研究方法逐渐变化的情况，收录时没有作实质性的删改。第三组是我参与“走近徐福”活动的记录，算是一个纪念。这个活动因种种原因未能全部实现，但毕竟还是编成了一部电视记录片，总算划上了一个句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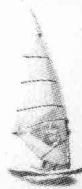
徐福研究的发展方向，我认为仍应从两方面去开拓。首先是大力开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徐福传说的采集、传承和研究，并借此给旅游开发提供更生动的素材、更广阔的想象空间。在历史考证难以为继的情况下，这应是研究的重点。第二是继续开展徐福东渡问题的史学考证，在原典性实证的前提下，努力解答徐福研究中尚无定论的问题。当然，在原典性实证资料缺失的情况下，通过非直接材料进行某个历史进程的可能性的推论，也仍是必要的，但要防止由此作出武断的定论。

2007年7月20日于秋斋



目 录

自序	(1)
古代移民和徐福东渡	(1)
一、秦以前的移民海外	
二、徐福东渡事件概述	
三、徐福在吴越地区东渡的可能性	
四、古代日本的吴越移民王国	
五、吴越文化和日本弥生文化的关系	
六、从韩日地名与地方传说探索吴越文明的传播路径	
七、日本民间徐福祭祀活动及其与吴越地区的关系	
试解“徐福西归之谜”	(46)
附：赋徐君房西归赠洪淳晚先生	
一份厚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达蓬山徐福传说	(55)
附一：羽田孜致田岛孝子函	
附二：徐福传说：《三蟾戏水》	
中日徐氏宗族史资料	(67)
附一：宁波地区现存80多种徐氏宗谱目录	
附二：给宁波日报记者董小军的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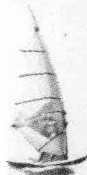
中日民俗的比较	(81)
答西日本新闻记者南阳子问	(83)
关于徐福研究的几点建议	(89)
徐福研究四议	(94)
达蓬之路的探索	(103)
文献上的徐福东渡	(111)
达蓬山地区的徐姓宗族	(126)
戚天法长篇小说《徐福东渡》跋	(129)
慈溪出现徐福研究热	(133)
看两位演员演《徐福东渡》	(135)
一衣带水两相知	(139)
贺神奈川“新大明神口碑”落成	(142)
沉痛悼念内藤大典先生	(143)
“走近徐福”系列活动策划书	(144)
“走近徐福”系列活动拉开帷幕	(149)
写在文献纪录片《我们的徐福》公映之际	(151)
中国各地的徐福遗迹和传说	(153)
《走近徐福》电视片文字提纲	(165)
后记	(243)

古代移民和徐福东渡^①

一个地区的文化在另一个区域的传播，以致一个民族的文化向另一个民族聚居区的传播，有许多不同的方式，其中最重要、最为有效、最合乎文化自身发展规律而又以最自然的方式进行的，则是由大规模移民所带来的移民文化。如果只是少量的外来移民加入到一个新的迁徙地区，他们会“随乡入俗”，主要按照当地社会的文化传统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他们带来的一些文化成分虽然也会被当地的主流文化所吸收，并对社会整体产生一些补充和调整的作用，然而影响不会很大。但当大规模的移民出现时，情况就会很不相同。大批移民所带来的母体文化，在一定的区域内将会与原住民的文化势均力敌地长期共存，两者互相撞击、互相竞争、互相渗透、互取所长，经过对两种文化的自然比较、选择融溶，其结果就可能产生一种既有当地特有传统，又揉进了大量外来文化成分的新文化形态。

中国华夏文化对日本的深远影响，在殷商至秦汉间，主要是大量移民的结果，其后才逐渐有官方使者的考察和朝觐，直到七世纪前后日本形成统一的国家，才有遣隋（唐）使、遣倭

^①本文为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基金（2001）资助项目《吴越文化的越海东传与流布》之第三章，见原书111-152页，学林出版社2006年3月出版。





使这样的外交、留学制度出现。因此，我们研究吴越文化在东亚的传播时，首先要考察的是我国古代向东亚移民的情况，而徐福东渡则是古代移民中一个突出的实例。通过对这些古代移民现象及其影响的研究，有利于我们揭开吴越文化向东亚传播的历史迷雾。

一、秦以前的移民海外

中国东部沿海居民向海岛的迁移很早就开始。今天的舟山群岛与宁绍平原最早连在一起，群岛以东还有广阔的平原，日本的西南海岸也远在今海岸以西的地方。随着卷转虫海侵的发生与海平面的逐渐上升，原来聚居在大陆东海岸的越人祖先（建德人或河姆渡人）不得不进行大规模的迁徙。他们迁徙的路线，据陈桥驿先生的分析：“一条当然是越过舟山丘陵内迁到今宁绍平原，另一条可能是外流，利用原始的独木舟漂向琉球、南日本、南洋群岛、中南半岛和今中国南部各省沿海等地。其间也有一部分利用舟山的丘陵地形安土重迁。”^①这个论断，如果联系历史地理学的研究成果来看，是可信的。当时我国东部海岸，距日本西南沿海并不像现在这样遥远，舟山群岛的形成，也是在距今1.2万年海面上升到60米之时，而今上海的嘉定、松江，浙江的杭嘉湖平原和宁绍平原一带沦为浅海，则是直到距今7000—6000年海进停止时才发生的。有一部分越

^①参阅陈桥驿《越族的发展与流散》，见《东南文化》1989年第六期。

人为避海进，向当时的日本列岛迁徙，虽然还没有直接的考古证明，但根据间接的考古资料和按情理进行的分析却是完全可能的。

有文献记载的移民，最早的则在我国殷商时代。殷灭亡时，殷王族箕子率5000人移居朝鲜半岛南部，在当地传播了殷文化，建设了相当安定的社会。对此，《尚书·大传》有记载：“武王胜殷……释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释，去之朝鲜。”《史记》也有同样的记载。我国史学家李季先生曾据此并参考《古今图书集成》和朝鲜史的资料，认定箕子曾率领了5000中国人入朝鲜。^①关于箕子在朝鲜半岛南部立国的情况，《汉书》中有这样的记叙：“……教其民以礼义，田蚕织作。乐浪朝鲜民犯禁八条：相杀以当时偿杀；相伤以谷偿；相盗者，男没人为其家奴，女子为婢。欲自赎者人五十万，虽免为民，俗犹羞之。嫁娶无所讎，是以其民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不淫辟。其田民饮食以笱豆。”到我国战国时代末，箕子朝已传至四十代，其继承者名箕准。对箕子的功绩，战国时期就很受人称道，孔子对箕子在朝鲜的作为就曾表示极大的钦佩，他在《论语·卫灵公第五》中就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箕子迁朝鲜说明，早在殷商时代，我国东夷部族的后裔就曾大批移民东北亚和东亚。而朝鲜半岛南部与日本仅一水之隔，客居朝鲜的中国人进一步南迁日本列岛，当然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日本方面对此有大量的记载和考古证明。

到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中日两地之间已有相当广泛的交流，当时我国诸侯争霸，战乱频仍，有许多齐、鲁、燕、赵、吴、越之人，逃往朝鲜以致间接或直接到了日本。《越绝书》有“内越”、“外越”、“山越”等名称，这“外越”又作“东海外越”，指的大约也是入海东迁的越民。日本平安朝编撰的

① 李季《2000年中日关系史》148页，学用社民国廿七年版。





《新撰姓氏录》诸蕃卷中开列的204户大陆移民，其中有14户其先祖就是春秋战国时人。这些记载在近年还得到了考古发掘的证明，例如日本鹿儿岛熊毛郡南种子町广田遗址出土的贝制品（明器）上的符咒、图案、纹样多与中国战国墓中棺底图纹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战前在冲绳岛那霸市的城岳贝冢中发现的燕明刀币，也已考定是日本绳文中期的遗物，也应是春秋时期被带往该地的。而且，从地图上看，鹿儿岛和它南面的冲绳岛都在日本列岛的南边，那里离朝鲜最远，却与我国吴越地区遥遥相望，这些中国春秋战国时的器物，就很有可能是吴越地区的移民直接带入的。

在春秋战国时期向朝鲜、日本的移民群体中，有大量的吴越人是无可置疑的，古代中日文献中有不少春秋时期吴越人迁往日本的记载。《资治通鉴》说，公元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其支庶入海为倭”；在史书关于古代日本的记载中，也说日本人常“自称为泰伯后”，其民间风俗也“一如吴人”。日本平安时代编修的《新撰姓氏录》中，也有“松野吴王夫差之后也”的记载。安志敏先生谈到古代通往日本的诸多海途时，提出由中国东海岸直达九州的“东海通道应是文化交流的重要路线之一”，他从考古学角度指出“日本的稻作农耕、干栏式建筑、玦状耳饰、漆器、鬲形陶器和印纹陶以及环壕聚落、坟丘墓的出现，都和中国江南文化有密切的联系。”^①由此证明了吴越至日本的大量移民的存在。

在日本发现的中国古代文物中，有一些原产于北方的个别事例，这也不能作为否定吴越海外移民的根据。因为一方面迁入日本的“渡来人”的来源，本来就是多元的，朝鲜人、南洋人、中国人同时并存，在中国人中，江南、江北并存，只是以中国的江南人为主而已。而在吴越移民带往日本的文化和器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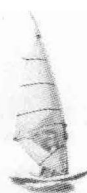
^① 安志敏《江南文化和古代的日本》，见《考古》1990年第四期。

中，有某些北方的成分，也完全是可能的。古代文献的记载和考古资料证明，古吴越的开国国君，本来就是北方歧周之地的泰伯、少康，他们让国于季历，南奔古越地区建国，自然也带来了北方的文化；后来，越灭吴，又在公元前468年迁都山东琅琊，一直到公元前379年才迁回吴地，在那里经营了近百年。因此，在吴越文化中有某些北方的成分是很自然的，吴越人手中某些北方器物也是不足为奇的。春秋战国时期赴东亚的移民潮中，有大量吴越人仍是无可置疑的。

至于秦汉时期，除徐福集团外，据《日本书纪》载，还有“秦公之祖弓月君率百廿县民归化（有人考证，“百”系“貉”或“拍”字）”和“汉阿知使主率十七县民来朝”两次规模很大的移民事件，有“秦、汉、百济内附之民各以万计”移居日本。这些移民到日本后“秦氏分散，隶寄他族。”到雄略天皇时（公元417年），“遣小子部雷、阿多、隼人等搜罗鸠集，得秦人九十二部，一万八千六百七十人。”关于这一时期的具体情况，我们将在研究徐福东渡事件时一并加以讨论。

二、徐福东渡事件概述

秦汉时期，出现了一股由大陆至日本的移民潮，徐福东渡是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一次集团移民事件。对发生在公元前三世纪末的徐福东渡事件，中、日、韩三国历史文献中有大量的记载。到20世纪80年代初，随着江苏赣榆徐福故里徐福村的发现和日本吉野里弥生初期文化遗址的发掘，犹如一石激起千层



浪，掀起了一次徐福研究的热潮，人们开始通过沉睡了数千年的历史资料，去辨认二千多年前发生的历史事件的真实面貌，考古发掘的成果，使这些资料的内涵才得以逐渐显露出来。

在具体讨论徐福时期的移民潮与吴越之间的关系之前，我们先对徐福东渡这一事件的大致情况作一概括的介绍。

《史记》是记载徐福东渡事件最早的典籍，书中详略不等地记载了秦始皇与卢生、韩终、徐福交往的文字，其中直接写到徐福东渡事件的有四处：《秦始皇本纪》中三处，《淮南衡山列传》中一处，共约二千余字。其大意是说：秦始皇二十八年即公元前219年，始皇第二次巡幸至琅琊，徐市等上书说海中有三神山，可携带童男女求之。於是始皇遣徐市发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七年后，即公元前212年，始皇因侯生、卢生相继逃走发怒，并责怪“徐市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再二年，即公元前210年，始皇第五次巡幸南方后回到琅琊，徐市又诓骗他说：“蓬莱药可得，然常为大鲛鱼所苦，故不得至，愿请善射与俱，见则以连弩射之。”秦始皇于是命令准备捕鱼器具，驻船上等候大鱼出现，想亲自杀死它。船行至芝罘，终于射杀一条大鱼。此事的结果，本记中没有继续交待，但在《淮南衡山列传》中却说：徐福入海求仙回来后，谎言已经见到了海中大神，描述了仙山的情况，并说，若要得仙药，必须答应海神的要求带去“令名男子若振女与百工之事”。于是“秦皇帝大悦，遣振男女三千人，资之五谷种种与百工而行。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

从司马迁的记叙中，我们可以得出如下几点看法：

首先，在《史记》中，徐福描述的所谓仙山、仙人，几乎全部是徐福对秦始皇的“说辞”，第一次是促使始皇下决心派人出海求仙，二、三两次则既为自己未能求得仙药作辩解，又借口有大鲛鱼作祟和海神的索求，要求提供人员、武装、

物资等等同行。对徐福的那些借口，司马迁在文中特意指明是“诈曰”、“伪词”。因此，正如我国秦史专家马非百先生所判定的，徐福东渡事件的性质，并不是出海求仙，“实欲利用始皇求仙之私心，而借其力，而自殖民于海外。观其首则请振男女三千人及五谷种种百工而行，次则请善射者携连弩与俱。人口、粮食、武器及一切生产之所资，无不备具。其得平原广泽而止王不来，岂非预定之计划耶？”^① 也就是说，徐福东渡是一次为避秦而进行的有计划的海外移民活动。史书中的神幻描述，只是诓骗始皇的“伪词”、“诈曰”。

其次，《史记》对徐福事件不仅记述多达四处、篇幅多达二千余言，而且将它放在《秦始皇本纪》和《封禅书》等记载国家大事的篇章中，与秦始皇的封禅大典紧联在一起，对所化费用的记载又相当肯定，一再说“费多”、“费以巨万计”。而对制造兵马俑、建始皇陵这样浩大工程的花费却只字未提，可见徐福东渡事件是秦皇朝的重大事件。

再次，《史记》记载徐福东渡活动，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过程，时历9年之久。徐福首次出海只带童男女数千，到第三次出海，却在童男女三千人之外，又带了五谷种种及百工、善射者同往。看来，徐福对将要前往的地方曾作过细致的调查，他正是从那儿的实际情况出发，才提出了进一步的物资和人员配备的要求。

另外，《史记》中转述徐福事件的伍被，生于徐福东渡后20年，其父母是徐福的同时人，他的关于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话，说于公元前124年，离徐福东渡仅86年。这就是说，徐福东渡后最迟不过数十年，社会上就流传着徐福“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话，对徐福所到之处的地形地貌，徐福到达后的任职情况言之凿凿，也没有用《史记》对可靠性不

^①马非百《徐福传》，见作者秦史专著《秦史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





强的资料常用的“传言”加以说明，这应是有充分根据的。

《史记》以后，有关徐福东渡及其相关事项的文献很多，书中关于徐福东渡的记述，都源自《史记》，有的补充了一些细节，大都来自民间传闻，史实的可信度不强。但这些记载中关于日本列岛情况的资料，对于徐福研究却十分重要。秦以前提及日本列岛的文献，《山海经》中有“近日出处，扶桑”和“盖国在巨燕南，倭北，倭属燕。”；《论语》中有孔子“道不行，乘桴浮于海”和关于“予欲居九夷”等几段话，数量很少。到徐福东渡以后，《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舆地记》等开始把海外的情况以及移民海外、侨民回归、使者来往等作为重要内容来加以记载。并开始将海外的一些情况和徐福东渡事件相联系。到五代缙徒义楚撰的《义楚六帖》，更明确指出徐福所到之处是日本。

这些记载对徐福研究的意义在于：第一，自西晋至南朝的史学家们用近似于今天文化人类学的方法，提出徐福“止王不来”的地方是倭、东鯷、澶洲、亶洲。而倭、东鯷、澶洲、亶洲即今天的日本，夷洲则是中国台湾。由于台湾与大陆仅隔一海峡，往来并没有那么困难，而且自古以来，从没在此发现徐福立国不回的资料，因此，那“平原广泽”该是日本。第二，日本列岛的大陆系居民，公元初就已自认为是秦人，是太伯、徐福的后代。而大陆上也已了解在茫茫东海中还生活着一批华夏同胞，承认他们是大陆移民的后代。第三，在徐福出海之后不久，中、日、韩三国就一直流传着关于徐福东渡的传闻。总之，人们一直深信《史记》关于徐福率数千人出海并“得平原广泽，止王不来”的记载，并把日本列岛当时存在着的大批“同于华夏”的居民的事实相联系，推测他们是徐福集团的子孙，从而说明徐福“止王不来”之处是日本。

在日本方面，也有许多关于徐福东渡的文献记载。日本5世纪才开始使用文字，直到公元8世纪才有《古事记》、《日

本书纪》这样的历史书。这些史书中有不少秦人的记述，但没有徐福东渡的直接记载。到日本平安、镰仓时代（约十世纪），《富士古文书》始记有徐福到富士山的事。到1393年，北畠亲房写的《神皇正统记》才公开承认徐福传说的真实性，并附记了日本宝刀输入中国和徐福携书籍到日本两件事。《富士古文书》和后来的《东海琼华集》等更指出徐福集团的到达地是富士山、熊野和名古屋热田等处。此后，林罗山、松下见林、新井白石、泷泽马琴、谢芜村、葛饰北斋、桔南溪等人的史学著作以及许多地方性资料，都有大量关于徐福在日情况的记述。总之，日本文献对徐福东渡事件的记载，远较中国为晚，内容大都源自中国史书，只是补充了大量来自日本民间的传说。不过，随着研究的深入，对日本文献的理解出现了新的突破。日本的壹岐一郎等先生指出：一向被看成国史的《日本书纪》“是一部充满错误的正史”，书中有意回避了中、日、韩的密切交往，特别是隐去了徐福，其根源是主持编写的藤原不比等“为了自己和自己一派的利益，偷换了史实”^①。其中包含着向朝鲜扩张和把日本的统一立国年代从七世纪中叶提前到四世纪的意图。《古事记》和《日本书纪》，在日本是一直不容讨论的。

到了当代20世纪80年代，中日两国学术界掀起了徐福研究的热潮，吸引了历史学、考古学、航海学、民俗学、民间文学、医学、方志学等各学科专家学者的积极参与，也得到了广大史学爱好者、文物爱好者和民间文艺爱好者的响应，显示出广泛的群众性和严谨的学术性。在历时近20年的讨论中，基本确认了徐福其人和徐福东渡事件的历史真实性；基本确认徐福们“止王不来”的“平原广泽”是现在的日本，系统地考察了

^①壹岐一郎《徐福集团东渡与日本古代社会》第184页，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第一版。

